



政治·哲学笔记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名著《审美之维》一书中，有我反复引用并信奉不已的一句话：文化或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她能够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 李晓兵/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政治·哲学笔记

■ 李晓兵/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哲学笔记/李晓兵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80211-860-7

I. 政… II. 李… III. ①政治学-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D0-53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6586 号

政治·哲学笔记

出版人 和夔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话 (010) 66509236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350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 272 千字

印张 32.5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代序：文化哲人

人们往往把世上的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学院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罗素……其著述成体系，按人类知识的问题，一本一本地写成书；一类是非学院哲学家，苏格拉底、尼采、萨特……其思想尚闲散，然生活丰富，影响极大。事实上，除以上两类外，还有一类，就是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既无前一类那样刻意著书，高台讲章；也无后一类这样无拘无束，浪漫激情。他时而出没于学院，时而逍遥于社会，这种哲学家，姑称之为以哲学本身为趣味的哲学家。尼采、萨特这些人明搞哲学，实在于济世社会；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罗素这些人表面上出入于学院，实则在于对理性的追寻。而维氏一生在于把哲学作为趣味。

难怪权威评论家、英国的赖特先生这样谈论维氏：“他觉得他好像是在为那些具有与当今人们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不同的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作，好像为了另外一种文化的人。”按一般的哲学家标准衡量，维氏很难说是在搞哲学：他一生都对机械制作及动手干活感兴趣，时而试验风筝的飞行，时而想制造一个机械推进器，晚年仍倾心于博物馆中的蒸汽机；他爱好音乐节奏的研究，喜欢吹单簧管、口笛；他乐于到边远山林当小学教师；甚至动手为姐姐修房造堂花费了近两年精力。兴致来时动手雕出一女孩或一小精灵的头像，兴致不高时就在笔记本上写些人生、死亡之类主题的遐想。当兵被俘时，背包中装着自己的哲学著作；和平时进学院，却感到“逻辑是地狱”，

哲学这行干不了。他觉得自己“还能创造些东西”的时候，便搞点哲学；觉得无聊的时候，就到爱尔兰乡下去过那种农夫式的隐居生活，出出入入，逍遥自得。他对出书无兴趣，生前仅出过一两篇（本）著述，然而，他只要写起书来，就具有“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赖特语），以及要达到对“最深奥的哲学问题”的“完全的理解”（马尔康姆语）。他性格易怒、多疑、吹毛求疵。然而，其苛求的一面，正好等同于他热情、关心、富于同情心的那一面。他始终“认为富有人性的同情和关心，在一个人身上是比智力和文化趣味更为重要的品质”（马尔康姆语）。美国爱德华主编的《哲学百科全书》以一种权威的语气对他作出评价：“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创造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第二个体系却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维氏作为哲学家，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在他独特的哲学鉴赏趣味。

这种趣味，首先是一种玩味思索。一般说来，维氏哲学思考得之于哲学古籍者甚少。今人写书的一般程序是，先找一些有关的书籍，抄录一些卡片，然后引经据典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其思路，其写作冲动，全在于所看的书的价值。一旦离开了参考书，今日许多搞哲学的人，就很难下笔了。而维氏则相反。他的哲学思考，几乎与哲学传统无甚联系。因此，他所提出的问题，有许多突兀、奇特，简直难以在传统中找到一种参照。这些问题，许多产生于日常玩味中。中国古人云：道在尿、屎、瓦砾之中，即是此义。例如，维氏在描述那些执迷不悟的哲学家时，曾这样谈到：“一个人陷入哲学家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他还这

样描绘过一种哲学上的迷惑：假如有一根绳子沿赤道把地球紧紧地箍住，现在，假若把这根绳子接长一码，如果仍将这根绳子绕地球箍着，试想，它会高出地面多少？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假思索地想说，绳子离地面的距离非常微小，以致难以发现。但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实际上，绳子将离地面六英寸。维氏认为，哲学错误就是这样出现的。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被一种图像所迷惑。上述谜题中使我们产生迷惑的是这样一种图像：我们把后来增长的那一码长的绳子与整个绳子的长度相比，因而觉得微不足道。我们因此迷惑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在哲学上的失误，常常是被类似这样的心智图像所迷惑，而这些图像自身却是真实的、正确的。对于这类图像，维氏还举过另一个例证：当把地球画成球形后，球上的我们相对另一端的人是头朝下的（记得我小时候就这样想过：地球下方的人为什么头朝下而不掉下去？）。其实，这幅画并未错，错的是我们心智中的图像（解释、理解）。在这种思想的玩味思索中，维氏哲学思想的核心揭示了出来：世界的图像常常错误地反映在我们头脑中。因此，要弄清我们头脑的图像，就应弄清我们图像与世界图像之间的关系；质言之，弄清世界的结构与我们的语言结构（思维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弄清事实的存在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语言，常常被误用，常常并没有反映事实，而是歪曲事实。这就是传统哲学的弊端。在他早期，他试图把我们自身的语言逻辑化、形式化，或者说，把自身的图像变成一幅标准的图表，来避免哲学的失误。当然，他后来改变了这种看法。不过，即使在这种改变中——实质上严格地说应是方法上的彻底与深化——他仍运用了独立自主的玩味思索。维氏的朋友回忆道，有一次，维氏散步经过一个场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于是，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在语言活动中是运用语词进行游戏。而这一思想成为他后期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所谓语言游戏说，即是指出，语言或思维中，没有标准的、普遍适用的逻辑法则，只有

一种随意的、活而不乱的、可理解的，然而又很难界定的“用法”。其实，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就像许许多多的游戏，有智慧为主（桥牌），有格斗为主（武打、拳击），有娱乐为主（台球、扑克的一般玩法），等等。虽都为游戏，但玩法、目的却各有差异。也像一大家族，虽多少有些相似，但绝指不出这种相似的规律性：鼻子、眼睛……这些思想，实际上为当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分析哲学）提供了基本思路，也为以逻辑为支柱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语言及其用法为依托的语言分析哲学递嬗演进提供了契机。这些思想，在维氏那里，不是通过读万卷书或行万里路得到的，而是依靠一种体会、玩味，一种把哲学当作生活乐趣的鉴赏哲学态度悟到的。在维氏的启迪下，20世纪最重要的一种哲学观遂诞生了：

所有真正的命题（哲学句子）都应当是基本命题符合现代逻辑推衍的成果（真值函项）。逻辑上的真实（或真理）是一种重言式的东西（同义反复），它不表述任何实在世界的真实内容；因此，哲学并不包含任何理论体系，它只是一种怎样把思维弄到更加明白的活动。

当20世纪的一些哲学家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清理思想本身的活动时，哲学就谦虚谨慎起来。它不再拼命地去构筑庞大的真、善、美体系，不再可能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总和，不再会对一切问题都有发言的权利并提供答案。哲学就是哲学。哲学实质上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回到了它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定义：爱智慧的活动。哲学成为一种追求自己的劳作：它从自己的最基本的根基——词出发，艰难地通过词与词之间的逻辑联系，不断地弄清自己本身的含义、意义，而不是世界本身的含义、意义是什么。而且，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仅从世界走入逻辑，而且又从逻辑走回世界。他早期强调对思维、语言进行逻辑构造，后期则强调打破语言思维的逻辑构造，回到原来的用法。他晚年认为应在语言的动态使用中去把握语言和人的思维，而不应在逻辑中（像一部闲着的机器）圈闭思维。时常

是，我们总觉得世界模糊不清，而我们的理智、思维可以弄清，并看清世界；然而，实质上，我们往往是头脑不清楚，世界本身是清楚的、澄明的。语言本身的用法是明白的，而我们运用语言时却是混乱的。回到生活中，人会感到活力；回到语言的日常中，语言会获得生命。哲学在认识世界，更在远离世界。哲学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混乱、吹毛求疵，实质上是哲学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混乱、没有生机。世界仍然是世界。而且，错误的哲学思想，如维氏所说，就像瓶中的苍蝇一样，看见了瓶口，却仍然在瓶壁上碰来碰去，总是难以找到出路。之所以找不到出路，是因为它被玻璃所迷惑，认为自己面前处处是出路，认为自己向前碰去的就是外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维氏晚年哲学观，即在于告诫人们怎样摆脱哲学。他说：“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某个特殊目的而搜集许多提醒物。”哲学是醒世恒言，告诫世人不要迷住哲学。不要迷住哲学的实质，在于告诉世人，不要为了哲学而忘掉人生。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人问一位高僧：“成佛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僧曰：“成佛的最大障碍是想成佛。”以此比附维氏虽不大相宜，却可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就过渡到第二点。维氏哲学中，有一股甚为强烈的形而上冲动。在解释这种冲动时，有人仅仅从他的宗教情绪着眼，甚至认为这是维氏思想不彻底处。我不这样看。我认为，维氏思想中之形而上特性，正是其为哲学家之最显著特点。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否认维特根斯坦对我们以上讲的那些哲学问题有着一种体味、鉴赏。但是，大多数人没有看到，维氏作为一种“道洽大同”的哲学家，在更深的层面上，具有与许多人文哲学家的相通之处。在一般层次上，维氏对语言的批判和回溯，找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出路；而海德格尔对语言哲学的批判和回溯，也为存在主义找到了出路。这实质上是一条殊途同归之路。归于何处？归于人生，严格地讲，是人本身。维特根斯坦是当代逻辑—科学流派中最怪的一个人。他从叔本华、克尔凯

郭尔、托尔斯泰那里得到的乐趣和启迪，远胜于从那些哲学历史、或当代科学—分析流派的哲学家的书中所获得的乐趣。在气质上，他很像尼采，赖特说：“他摆脱了那种希望显得与众不同的虚荣形式，他就不可避免地同他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也许他真是生活在精神病态的边缘，他终生都害怕被推过这个界线。”他有一种孤傲、自强的气质。在哲学思考上，他像海德格尔，把每一种哲学思考都推到它的极端。他试图去说那种不可说的终极实在，把这作为最大的哲学探险。他说：凡是不能说的东西，就应当保持沉默。人们一般把这理解为是对形而上学的限制，其实，从维特根斯坦的气质和后来思想的发展看，是对形而上学的开放：少说或不说才能更真诚地进入“思”。就像海德格尔说：少谈些哲学，多注意去思。他有托尔斯泰那种人生的激情，他说：“一种表述只有在人生之流才有意义。”他讨厌虚伪，坦率承认“我的生活充满着最可厌和无聊的思想和行为（这不是夸张）”。他在给罗素的通信中，认为自己同罗素有不同的理想：“也许你认为思考自己对我是浪费时间，但是，假如我连人都不是，我怎么能做一个逻辑学家呢？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必须先成为纯真的人。”这也许就是他不执迷于仅仅混个教授头衔和出本书的原因。这也就说明，他为何把享有哲学盛誉的牛津，看成是“一块哲学的沙漠”。哲学并不就是大学中、书本中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是横亘在 20 世纪科学与人本两大思潮之间的桥梁。他表现了两种哲学共同的东西：追寻人的普遍理解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然而，他又是两个哲学阵营都无法理解的人物：人本主义认为他太理性，而科学—逻辑学家会说他太浪漫。

维特根斯坦死于癌症。他对生活有着奥古斯丁、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悲观感受，但在对自己死的情绪体验上，却丝毫没有这种感受。他死前谈到哲学。他一生想搞哲学就搞哲学，不想搞就到社会上干点什么有意味的工作。他死后

留下的几本著作，几十年后，恐怕会随着分析哲学的消亡而被人们遗忘。这真是一个遗憾。但也未必。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分析哲学家。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他是一个古怪的哲学家，是哲学怪杰。因为他把做哲学家和做人统一起来了，而情形往往是：做哲学家就必须牺牲做普通人那样的乐趣。不过，读他的传记，看他那如同伴着现代音乐节奏一样的论述，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人”。

记得 20 年前，有几位硕士、博士研究生走访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当老教授问及“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哪些人”时，学子们众说纷纭。而教授本人认为有四位。四位中，只有一位是所有学子们没有猜到的，那就是：爱因斯坦。也难怪。因为在我们的哲学中，完全把爱因斯坦排除在哲学殿堂之外。

只要读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一、二、三卷，就会深感爱因斯坦确为地地道道的哲学家。我们以往对爱因斯坦的理解，不在于爱因斯坦够不上哲学家的水平，而是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太偏颇、太狭窄。

哲学，就其本义看，是对智慧本身的一种爱。普普通通的人，也是热爱智慧的，因此，普通人也懂一些哲学。但是，普通人不能成为哲学家。这是因为，他们对智慧的爱，是出于某种目的，智慧从根本上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中国传统老百姓思想深处都有“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其注重教育和读书，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但古时中国人的读书，终不过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齐家），或“衣锦还乡”（作官）。所以，普通人爱智慧和哲学家爱智慧是两回事。哲学家爱智慧，首先是出于对智慧本身的热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笛卡儿、康德等人，在创立其思想体系时，原本并不是为了其他目的，不过是使人生

理性、意识、心灵、主体性等智慧特性更加清晰、生动、和谐。同样，爱因斯坦在创立崭新的物理学基本概念和方法时，原本并不是为了运用，而是追求理性或智慧本身的和谐。在他的文集中，处处可以读到对哲学家斯宾诺莎、马赫的爱恋。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斯宾诺莎修身出于对理性的热爱，因而不得不尽传统思想、饥寒交迫、孤独寂寥的折磨。爱因斯坦把他称为与马克思、摩西并列的三个伟大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都体现出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这些，也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真切写照。而马赫似乎对爱因斯坦影响更大。马赫交给爱因斯坦的不是一堆现存的结论，而是批判、怀疑的经验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以自然本身的面目看待自然，或以科学—实验的手段去观察自然。从休谟以降的经验论怀疑传统，对所有当代物理学家、科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传统，实质上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方法：以自然之眼观物。这与自柏拉图以降的另一种方法相对峙。柏拉图代表了西方另一传统：以理念或理想的观点看世界。一个是在世界之中，一个是在世界之外。爱因斯坦及许多科学家、实证哲学家在世界中，而思辨哲学家、体系哲学家则多在世界之外。一是实在的经验观察，一是超验的先验构想；康德企图综合这两个传统，为它们各自划界限。爱因斯坦在这个意义上继承了康德的一些思想而超越了马赫，他认为，一方面，概念及思想之物由经验而来（马赫的观点），一方面，又认为思维自身的“创造性”直观和构造，能推动思维本身的发展（相对论的产生即是一例）。而且，爱因斯坦谈哲学、谈思维、谈经验或理性，是以一个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的身份，他手里握着可以被检验、可操作的科学盾牌，致使一般的哲学家很难与之辩驳。

我们说爱因斯坦是一位哲学家，不仅是因为他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紧密相联，不仅是因为他在创造物理学基本概念和方法时触及那些艰深的哲学问题，而且，就我

个人以为，还在于他那种敏锐的哲学素养和感受，而这是一般自然科学家所阙如的。这些，在他的文集中，俯拾皆是。当宗教和社会编造的谎言被揭穿后，也就是说，当一些敏锐、勇敢的哲学家在世纪之初叫喊着“上帝死了”而陷入一片虚无时，爱因斯坦的心境却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充实：“在我之外有一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如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企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地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和自由。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的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这个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的世界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个人，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被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这犹如《浮士德》中那个象征人生问题可能的最高的解决：通过浮士德的不断努力表现出了人生最高的价值和意义；也犹如《精神现象学》中那个向上艰难超升的人类精神；如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那个“绝对命令”；如萨特《存在与虚无》中那个处处不自由，又处处在渴求自由的“自为存在”；如巴门尼德、柏拉图、海德格尔都瞑目凝思的那个“存在”……真是道出了一种平淡深明、沉实宕森的哲人心境。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爱因斯坦本人在悼念马赫时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描述爱氏持之终生的这种心境：“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如此强烈地迸发出来，以致到了高龄，还以为孩子般的好奇眼睛窥视着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爱因斯坦生前多次引用叔本华的那句名言：人们能够想他

所要的，但不能要他所想的。以此来说明性格怪癖、沉默寡言、孤独静寂的思想家们，在摆脱日常生活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中，进入到知觉和思维世界中的悲凉心境。他把这比作是逃避喧嚣拥挤的都市，登上高山幽明之境，透过清新纯洁的空气，去自由眺望永恒和宁静的自然景观。他认为，促使思想家探索的动机，除了这种消极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动机，那就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他说，哲学家、画家、诗人、自然科学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从事这点：“他们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们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们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这也许就是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精神历程的目的。只不过是哲学家用概念思辨，艺术家用笔墨色彩，科学家用数学物理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去完成他们的人生使命，去达到他们的精神境界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句话了：科学家都离不开宗教。这里的宗教，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在目的没有达到前的内心鼓舞，或者说，对自然界中尚未认识到的规律的神秘性的一种出自自然科学家的笃信。这种笃信，类似康德的哲学。在科学范围内不允许玄妙的思辨，必须运用时空形式以及对时空研究的一切科学成果作为研究方法；而在尚未认识的那一片“物自体领域”，可以用思维的创造性去想象、去构造、去信仰。这种信仰，是科学基础上的一种信仰，它是建立在对已经认识的东西作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它是基于对科学及因果律或自然规律的信念，去洞察存在的未知奥秘。这种哲学，不容易盲从、轻心，更不容易僵化、停滞。它既固守着科学所占领的阵地，又遥望着尚待挺进的疆域。爱氏用一句话说出了这种信仰的真谛：“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程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连的上帝”。这种以健全的理智表达出来的信仰，

在 20 世纪初的历史氛围中，真是难能可贵。试看，此时的哲学界沉浸一片上帝死后，精神殿堂一派虚无、空荡的心境中；此时的文学界，除了人类精神漫无目的的下意识漫游之外，就是荒诞、滑稽的自我嘲弄。只有科学家于绝望中仍抱有一种对人类、对未来的乐观心情，只有爱因斯坦，在此时给哲学以慰藉。

爱因斯坦提供的那种批判方法，平和心境，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对世界、自然内在秩序的信仰，以及在晚年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性救赎所抱的乐观态度，多多少少影响了当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爱氏的学生石里克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哲学中强调方法，强调在混乱的哲学流派和情调中重新构造出有序的逻辑—科学体系，几乎成为一代又一代重理性、重方法、重逻辑的科学哲学家们的理论基石。爱因斯坦对当代哲学的影响，我想，究其根本，还在其治学、为人的精神。有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探索，当代人对科学的哲学使命更笃信不移：既然几百年牛顿力学的统治地位可以动摇，思辨哲学体系——这本身就不甚牢固的祀坛，推倒又何妨？有了爱因斯坦的探索，人们更坚信，科学尽管有它不可避免的弊端，然迄今为止，仍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有效方法。这就说明，在经受当代人本主义思潮那样猛烈的冲击后，为何科学与哲学的联姻双方情谊更笃。

也许，当你了解到爱因斯坦在晚年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科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而投身社会时，你会更加感到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同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的通信中，对人类未来和世界和平的关心，对科学与政治、学术与自由、个人与社会、社会主义与民主等问题的深刻阐述和勇敢精神，他在怀念逝去的科学家、思想家时表现出的那样一种激情，等等，都表露出他具有在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身上少见的对人类、对个人的负责精神。他对社会主义和新生事物的理解是理智的、宽容的。在他处的时代和社会，倘若没有他那种超

然的哲学境界和严格宽厚的科学精神，这是做不到的。他这样谈到列宁：“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献身的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他这样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

同样，假如我们不把他看成一个美国人或外国人，而看成一位公正无私的科学家的话，那么，以下这段话可谓 是科学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哲学胸襟，不仅表现在对他生活中的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还表现在对社会主义这个他所憧憬的未来实验的真诚关心。我们说爱因斯坦是一位哲学家，当然也包括这点。

总之，我们说爱因斯坦是一位哲学家，是就他毕生从事的宏伟事业，是就他对智慧或知识本身的热爱，是就他创造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 20 世纪科学哲学及其精神的激励，是就他对宇宙深藏着的秘密——尚待发现的规律的信仰，是就他对人类社会的现在和未来的良心、责任。爱因斯坦也是在人格、道德、文章方面难以挑剔的大思想家。

目 录

代序：文化哲人 (1)

—

论马克思主义跨世纪发展的几大课题	(3)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和历史：文化的批判	(16)
马尔库塞的哲学—美学思想：文化的审美之维	(33)
文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70)

二

文明的冲突与国际政治	(97)
现实主义的形成：政治权力或强力	(129)
现实主义与国家利益	(162)
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	(191)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232)
诺齐克政治哲学	(283)
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	(307)

三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文化矛盾	(343)
西方哲学文化观的演化及当代哲学问题	(363)
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哲学	(390)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431)

跋：论加强理论本身的建设	(490)
后 记	(502)

